

“女生强势现象”越来越普遍

国家奖学金性别失衡的背后



颁奖现场

新的国家奖学金名单公布：红花开遍 绿叶零星

近日，教育部官网上“2007-2008年度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名单甫一公布，便引起了古南辉的强烈兴趣。他是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的

大三学生。小古顺手拿笔算了一下，结果着实让他吃惊：以北京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体育大学为例，这6所典型的师范、财经政法、艺术、医学、农业、体育院校里，女生获国家奖学金比例分别为66.4%、79.9%、66.7%、100%、70.8%、58.9%。

“真是红花开遍，绿叶零星。”就在古南辉的母校，有428名同学获得殊荣，其中女生245名，占了57.2%，而武汉大学男女比例大于3:2。

国家奖学金由中央政府出资设立，用于奖励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中特别优秀的学生，奖励金额为8000元，是我国高校目前规格最高的奖学金。发放比例不到5%，足见含金量之高。

大学校园网内，不少人惊呼“女生凶猛”，“女生强势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班级奖学金 男生“剃光头”

“哎，我们班男生全军覆没了，连个做绿叶的机会都没有。”这是奖学金公布期间，记者在武汉某重点

高校校车听到的一段闲谈。记者走访了武汉一些高校，发现奖学金上的“阴盛阳衰”并不是个例。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本科生的男女生比例约为1:2.8，2008年9名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全部都是女生；覆盖面最广的人民奖学金在06和07级学生中有108名获得者，男生仅占24席。其中，对成绩要求在前20%的自强奖，多数班级甚至连一个男同学都没有。

即使男女人数比较平衡的院系，能够进入年级排名前三分之一的男生也是凤毛麟角。武汉科技大学刚留校不久的刘畅至今记得，学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03级两个班，共近百名同学，女生约占一半，有一年其中28人都拿了奖学金，男生则被剃了“光头”。之前一年的奖学金得主中也只有一名男生点缀其间。

在一些女生只有个位数的理工科院系班级，女生的位置也十分突出。武汉理工大学网络安全专业的陈同学介绍说，班上40多人只有7名女生，基本都能拿到奖学金；并且班里的前几名长期被女生“盘踞”。

高校招生的男生荒在加剧 班级中女生也更强势

女大学生揽下多数奖学金的一个背景是高校女生比重的逐步上升。

统计显示，女多男少的现象正从师范类、外语类等学校向综合型大学蔓延。甚至在交通大学等传统的理工科院校，女生比例也逐年“抬头”，那些土木、桥梁、机械等过去男生一统天下的专业，男女生人数的差距也越来越小，大有“平分天下”的趋势。

“每次招新报名女生很积极，我们已经在控制女生数量了，但是招的人基本上还是女生。”作为社团负责人，华中科技大学的徐道明

常常为“男生荒”着急。

“女生热心积极，班委和学生会中她们占了多数，这些女生都很优秀，她们在评选中有着很大的竞争力。”参与过奖学金评选的陈同学告诉记者，很多学院确定国家奖学金的获奖者时，都会征询各班班委和学生会干部的意见。

“这种影响力很微妙。”女生的“强势”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工作。

一些学校，奖学金评选采用的是成绩划分资格，最终由班级同学给候选人投票产生。华中科技大学07级学生卢伟强就曾有过一段奖学金落选的伤心故事。

作为年级屈指可数的成绩进入前40%的男生，他获得了人民奖学金自强奖的竞选资格。投票中，卢伟强和班级的一名女生得票并列第六，但是这个奖项的名额也正好只有六个。选举出现僵局，负责人决定再投一次票，两人“PK”。

卢伟强信心十足。作为班级生活委员，他平时在为班级做事时，跟同学们都混得比较熟。另外，他的加权成绩还略高于那名女生。而那名女生则缺乏这些优势。

“我忘了我们年级的男女比是1:2。”出乎他和许多人的意料，这名女生以超过三分之二的选票“淘汰”了他。

“我知道，女生的选票基本上都投给了她。”

学落选的伤心故事。

作为年级屈指可数的成绩进入前40%的男生，他获得了人民奖学金自强奖的竞选资格。投票中，卢伟强和班级的一名女生得票并列第六，但是这个奖项的名额也正好只有六个。选举出现僵局，负责人决定再投一次票，两人“PK”。

卢伟强信心十足。作为班级生活委员，他平时在为班级做事时，跟同学们都混得比较熟。另外，他的加权成绩还略高于那名女生。而那名女生则缺乏这些优势。

“我忘了我们年级的男女比是1:2。”出乎他和许多人的意料，这名女生以超过三分之二的选票“淘汰”了他。

“我知道，女生的选票基本上都投给了她。”

听课女生全战线压阵非常认真 她们在用辛劳换取安全感

古南辉关注大学里的“阴盛阳衰”现象已经一年多了，他阅读了大量女性研究方面的著作，平时还搜集大学女生的各种信息并同妇女研究机构人员多次交流。

对于女生在奖学金上的优势，他认为这并不是男女生之间的性别差异造成的。“女生在做事情时，目的明确，这使得她们更加注重短期行为。在学校里，学习好或考试分数高有着明晰的预期回报，她们知道该怎么安排当前行为，使行为直接导向目标回报。这使得女生在学习等方面更加积极，更有针对性。”

古南辉说，这样的场景在高校已经司空见惯：女生全战线压阵，黑压压地坐在前面坐了一片。而男生大多坐在后面不易被注意的地方。上课的时候，女生在前面认真记笔记，而男生在后面聊天、睡觉、看小说，还常常中途逃课。

古南辉的一个同学是哲学系的，大三下学期的成绩排在年级的第二名，保研是触手可及，但一个暑假之后，他却欲哭无泪。他的加权成绩变成了第九名，而保研只要前八名。原来，班上的好几个女生，突然在暑假里发了好几篇论文，加了分。

华中师范大学周小博士研究女性教育多年，在周博士看来，教育领域之所以出现所谓“阴盛阳衰”现象，一方面是男女教育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则是女生在压力下的奋斗。

周小博士认为，当今社会仍旧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掌握在男性手中，女性要想在社会领域取得与男性同样的成功，需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努力。在现实社会状况下，女生的就业压力更大，她们不得不付出更多的辛劳去



nsphoto

获奖大学生

换取一份安全感。

“阴盛阳衰”背后 我国教育的评价导向值得反思

在武汉科技大学高教研究所研究员李灿华看来，女大学生学业考分成绩优秀很正常。他介绍，有关智力与学业成就的研究证明，随着年龄增长，学业成就与智力的相关性越来越低，而与努力程度的相关性越来越高。这一点在青春期的教育阶段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女生天生更听话，勤奋学习，积极进取在大学比男生成绩优异，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正常中有着不正常。”李灿华研究员认为，国家奖学金评审考核的是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不仅包括学习成绩，还包括道德品质、社会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等，而很多东西根本没有办法进行量化评比，比如社会交往能力、人际关系等在大学生进入社会后就会显得尤为重要，高校虽然已经开始意识到并进行引导，但是实践学分、学生干部的加分方式无法反映出学生的真实能力，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成绩。

李灿华说，“学生是学校最好的产品，社会的认可也是对此最好的检验，一边是女生获奖优势的盛况空前，一边则是女性就业的尴尬与无奈，在就业歧视之外，不能不反思的还包括我们的评价体系本身的标准和引导方向。”

据《中国青年报》



获奖大学生(资料图片)

新闻时评

房地产成本 何时才能说清楚

据媒体报道，日前，全国工商联房地产业商会通过全国工商联，向两会提交了一份提案和两份书面发言。名为《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的大会发言称，全国工商联房地产业商会去年就全国9城市“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费用”的调查显示，在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

其实，无需看这个报告，经过房价多年的疯涨和围绕房价的诸多争议、讨论，老百姓慢慢也明白了，房价居高不下，根子不仅仅在开发商，只要地方政府在房价里面有切身利益，房价之贵就只能一直是个谜。

记得笔者有一次在央视新闻会客厅谈房价问题，我问王石为什么大多数开发商不主动降价求生存。王石的回答是：“这个你要问地方政府了，降不降价，不是我们说了算。”当时本人并没有明白他的意思，毕竟房价不属于政府定价范畴，价格的主导权还应该在开发商。但这个报告里的数字似乎为王石的话做了一点暗示或者说旁证。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全国工商联房地产业商会，呵呵，原来其成员有招商地产、万通集团、华远地产等大开发商，大名鼎鼎的任志强更是该会的现任副会长。全国工商联房地产业商会似乎是在为开发商叫屈，不过，笔者还是从数字中看出了一些端倪。根据这份发言，“目前我国房地产企业需缴纳的税费占总成本的26.06%，占总销售收入的14.21%。”——这就意味着，房地产企业的总成本只占总销售收入的54.5%左右。开发商的利润有多高，不小心被自己人曝了光。

如果大家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有跟踪，我想都不会忘记2005年围绕是否公布房地产的成本引发的争论。在强烈要求开发商公开成本的呼声中，福州率先公布了房价成本信息：在信息所列的23个楼盘成本目录中，开发商的利润率平均约为50%，最高的超过90%。但这个公布成本的行为，却遭到了开发商一致的抵制。所以到今天为止，对于我们所买房屋的成本，作为业主的我们是一无所知的。其实，在全部的房价里，地方政府究竟拿走了多少，开发商的成本和利润是多少，只需要三个数字就可以说明的问题，开发商们何必总是欲说还休呢？

从客观而言，“全国工商联房地产业商会”这么做，未必就是一件坏事。大家都知道，地价和一些税费的确是房价高的原因之一，需要地方政府对此有一个公开透明的说明。如果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能把房价的成本说清楚，得益的无疑就是老百姓了。当然，我更希望，如果任志强先生真有诚意，就请拿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率先公布华远在各个城市楼盘的成本，而不是拿一些含糊的调研报告，并且打着工商联的旗号来忽悠人。刘远

官员财产公示要多吸纳民智

全国人大代表、中纪委副书记何勇说：中纪委正在想办法制定官员财产公示的有关条例或者规定。新疆阿勒泰也在积极地试点和探索，有积极的作用，我们正在考虑它的方案。(3月8日《京华时报》)

3月9日的各大论坛上，网友们简直如同姐妹们“过节”一样，心情大好。这不难理解，官员财产公示是有效防腐机制，在今年两会上，代表委员再度热议此命题，加之温总理对此的明确表态，一定会使这个话题举国关注。现在，中纪委终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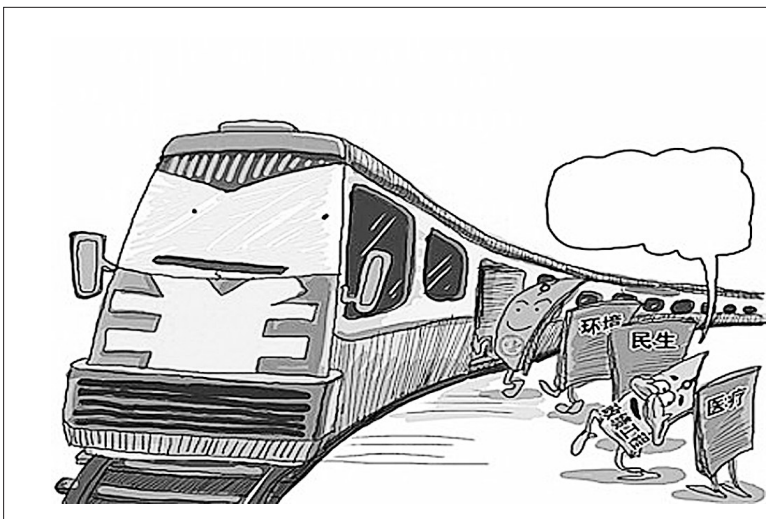
“正在想办法制定官员财产公示的有关条例或者规定”了，这怎能不令人雀跃。

可以说，官员财产公示已经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我们更应关注的是一些技术性的细节。比如，任职前如何公示家产；任职中怎样公示家产；离职后是否继续追踪家产；如何对那些突然“急流勇退”的官员加强动态防范，建立强有力的追诉制度；如何公示国企高官家产等，都需要明确细致的答案。

积极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官员财产公示经验是一方面，吸纳民智也是很重要

的一方面。所以笔者建议，制定相关制度要充分吸纳“民意”。网络民意，是体制系统向外敞开的—个连接器，每时每刻都在等待系统以外的力量有效地运用它。从最近“公款按摩事件”和“躲猫猫事件”等可以发现，一些网民和论坛逐渐担当起谏言与举报者的角色。所以，吸纳民智，网络可是个好地方，我们可以先搭建官员财产公示的网络平台，让网友对此充分讨论，这对于最后形成细致严密的官员财产公示规定，必定会大有裨益。

周明华



标志城浑水摸鱼

去年全国政协会议上，在获悉计划投资300亿元人民币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已“经国家发改委批准”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主任安家瑶连夜起草了一份紧急提案，明确对该项目说“不”，获得了115位委员的联名支持。此事经媒体报道引发广泛关注。而时过一年，记者了解到，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已作为“2009年重点工作”写入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这真是描眉，化妆，就想混上去！ 漫画/张永文

别再以改革名义折腾教育了

针对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委员建议应让大学生在学校里延长学习时间，不如设立硕士后、学士后，或者公费出国”(3月8日《京华时报》)；有人则建议大学教育恢复5年制，高职由两年制改为三年制，“第一年搞军训”(3月8日《中国青年报》)。

无论是“设立硕士后、学士后”，还是“增加一年搞军训”，最根本的目的其实就一条：想尽办法让大学生在学校里待着，在源头上不让他们就业，自然也就大大地缓解了就业压力。如果开辟从“幼儿园”直达“老人院”的教育专线，名副其实地

“活到老学到老”，不仅恼人的就业问题根本不存在，各级学校更可以财源不断、大发其财。

我很奇怪的是，为何最具知识的精英人士，却缺少最起码的反思精神和自省意识？那场旨在刺激内需的大跃进式高校扩招运动，真的无需反思与检讨吗？教育产业化和“教育官僚化”真的不是客观现实吗？先是本科大扩招，全面收费后的硕士也已大扩招，博士大扩招大概也已为时不远。

这些年来，高校的教育改革似乎一直遵循着这样一条公式：为了××，所以让

教育××。为拉动内需，所以让教育大扩招；为赚更多钱，所以让教育产业化；为缓解就业压力，所以额外安排一年大学生军训……教育可以为一切被认为有用的事情而改变，却唯独不会为教育而做一些有用的改变。教育只是作为殉葬品而进行着被动的改革，却从来不是作为最根本的价值和目标而进行着主动的改革。

“教育殉葬品化”已滋生出一个庞大而顽固的利益集团，教育被各种各样的由头改来改去，且仍在以殉葬品的身份被建议着做出这样或者那样的改革。

盛翔

个税是否调整 财政部不宜先定调

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3月7日在参加全国政协联组会的间隙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个人所得税的调整，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但目前能够调整个税的条件尚不具备。(3月8日《京华时报》)

官员在两会期间发表意见，本身也是在参政议政，但愿不是财政部的正式决定。

作为“还富于民”，调整收入分配的重要举措之一，早在本次两会之前，关于个税起征点乃至对个税进行全面改革的呼声就很高，民众对个税改革也期待殷殷。这个表态，的确出乎大多数的意料。据报道，一些委员对这样的表态深感遗憾，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宋林就认为：“你都定了，要我们来干吗？”

应当看到，我国目前的个税制度的确存在不少问题，不仅体现在起征点偏低，更体现在缺乏一个体现公平与效率的总体制度架构体系，从而在税负的分配上偏离了公平和正义，使得工薪阶层成了最大的纳税人。按照先前的人民网的一篇报道，中国的富人约占总人口的20%，但是他们上缴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到个人所得税收入的10%，而这个比例在美国恰好相反：将近50%的工薪阶层只承担了联邦所得税的5%，10%的高收入者承担了个人所得税的60%多，1%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30%多，从而形成了比较完美的“倒金字塔”的税收负担结构。

不仅如此，中国个税的设置很少考虑纳税人的家庭负担情况，也没有对住房、教育、医疗、子女上学、老人赡养等方面的支出实行抵扣或者返税制度。这些根本性的制度缺陷使得对个税进行彻底改革，为其植入民生和公平的内核，成为当下中国社会必须推进的重大公共事件。

笔者理解，所谓的“条件不具备”，无非是1月份全国财政收入较去年同期下滑17.1%，创下近年来最大跌幅，财政部要确保今年财政收入8%的预期目标，的确面临很多困难。但如果把财政收入的增长建立在挤压民众的“民生”空间上，个税不仅不能成为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经济增长的利器，反而成为影响社会公平和稳定的制度根源。

的确，个税改革关乎民生和公平，其在中国改革体系中的象征意义无可替代，千万不能为了单纯的财政收入增长甚至为了部门利益而废弃或推迟。希望本次人大能就个税的全面改革达成方向性的共识，尽快启动个税的深层改革，通过一系列配套的配套改革和整体的设计，真正实现高收入者多纳税，低收入者减负，使个税本身回归民生和公平。

马光远